

中國語文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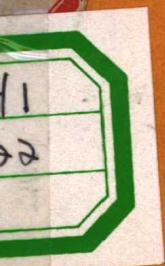
論漢語

蘇聯 З. И. Зыкина 著

彭楚南譯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新華書店經銷

論 漢 語

羅莘田先生紀念文集

羅莘田 著

華夏出版社

北京 100007



中國語文叢書

論漢語

王. 1. 王正凡教授著

彭楚南譯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是蘇聯漢學家康拉德教授對漢語各種問題的比較全面的敘述，它代表了蘇聯漢學家近年來對於漢語的大體一致的看法。作者用斯大林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觀點詳盡地研討了漢語中最重要的一些問題——漢語的性質、中國民族語的形成、民族共通語和方言、詞彙的音節構成和形態學等問題。這本書除了批判馬爾認為漢語是最原始的語言這種錯誤看法以外，尤其是有力地着重批判流行的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界的對於漢語的不正確的觀點——認為漢語是落後的、沒有語法的、詞彙貧乏的、單音節的孤立語。作者正確地指出，漢語是人類複雜思想的有價值的表達工具，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

本書適合於大學中國語文系師生、中學語文教師以及關心中國語文及文字改革問題的一般讀者的研究和閱讀。

本書的節譯文於一九五二年九月至十一月曾在《中國語文》雜誌連載，現在發表的是全譯文。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中國語文》雜誌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有關文字改革、語文科學常識、語文教學等等方面的論文或資料，還介紹了蘇聯語言學家的一些著作。今後也還要繼續這一類的工作。爲了便利讀者的參考起見，我們決定把這些文章分門別類，整理編輯，陸續出版單行本，總稱《中國語文叢書》。

同時因爲我們的雜誌篇幅有限，有些理論上有價值的較長的稿件，不便刊登或不便全部刊登。爲了補救這一個缺點，我們打算把這些稿件編到這套叢書裏面去，使它們能夠和廣大的讀者相見。

由於我們的雜誌印數有限，好多關心語文問題的同志們對已經出版的各期還沒有完全看到，或者沒法兒補買。有了這一套叢書，也許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

這套叢書的編輯方針，正和《中國語文》雜誌一樣，主要是推進文字改革運動，普及語文科學知識。希望全國語文工作者給我們批評，並就有關問題展開討論，提供意見，使這套叢書的內容得以改進，逐漸充實起來。

中國語文雜誌社

1953, 8, 1。

目 次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1
(1)ㄇㄩㄥ關於漢語的假說·····	1
(2)ㄇㄩㄥ的假說的錯誤·····	6
(3)漢民族的形成·····	8
(4)民族共通語和方言問題·····	14
(5)單音節問題·····	29
(6)漢語的形態學·····	41
專名音譯表(按ㄉㄤㄇㄩㄥ排列)·····	50

(1) П. Я. 關於漢語的假說*

兩年前，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的《真理報》上面展開了語言學問題的辯論。在辯論中，有些參加者引了П. Я. 的所謂“語言發展階段論”，來證實П. Я. 根據“語言發生時期的早晚”而造出的語言分類公式。這個公式的毫無根據，後來已經被 Л. Я. 揭露了。在這一公式中，П. Я. 把漢語列入“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裏。^①

根據這個公式的完整意思，“時期”這個概念（在П. Я. 看來有四個：原始、第二、第三、第四）也同時是屬於歷史的，屬於某種語言發生的時代的，屬於它在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水平和狀態的；換句話說，要把某種語言列入某個時期，就得同時回答兩個問題：這種語言什麼時候發生，它達到發展的什麼階段。因此，把漢語列入“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就等於說，第一，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第二，它的結構到現在還是“原始的”，屬於一般語言發展的原始時期的語言類型。

П. Я. 在他當時當然需要解釋，為什麼有着悠久歷史的語言還能夠沒有重大的變化，還能夠長時期停留在它發生的原始時期語言系統的範圍內（用П. Я. 的話）。П. Я. 從錯誤的語言發生過程一致論出發，做出這樣的解釋：在一種系統中產生的語言，可以過渡到第二種系統裏去，在這種場合下，它在一般語言發生過程中所經過的變化使它進入第二種系統裏去；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的語言（例如漢語）的過渡，就意味着它會進入第二時期的語言系統裏去。П. Я. 認為第二時期的語言系

* 小標題是譯者加上的。

① П. Я. П. Я.: «為什麼不容易做一個語言學理論家», 《П. Я. 選集》, 卷二, 406 頁。
(俄文)

統的代表是 X《ЭЛ·ЦЛ》諸語言、突厥諸語言和蒙古諸語言。世界語言發生過程的進一步的發展(漢語也應該參加在內)就應該把漢語帶到第三時期的語言系統裏去, ПУЛ 認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是“殘存的 IY《世去》諸語言”和 ГYП 族語言。既然在公式中只有四個時期,那麼漢語最後自然就——至少在咱們這個時代——應該走到第四時期的語言系統裏,加入 Δ世П 族語言和印歐語言的系統裏去。

但是, ПУЛ 說, 漢語並沒有這樣發展下去, 而仍舊停留在原始時期的系統範圍內。爲什麼呢? 這個問題的解答就要在 ПУЛ 的另一個錯誤假說裏去找: 某種語言由它所屬的語言系統的一般發展中脫離出來; 這個系統往前進, 而它留在後面, 脫離了這個系統的運動。

爲什麼這樣呢? 咱們可以在第三個錯誤的假說中找到解釋: “若干民族可能由一般的世界運動中脫離出來”; 如果某個民族脫離這個運動, 那麼它的語言也就脫離這個一般的語言發生過程。漢語所以會停留在“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所特有的狀態中, 就是因爲漢族“脫離了一般的世界運動”, 而漢語也就脫離了它原來的系統的一般發展。

讓咱們假想, 漢族有個時候實際上“脫離了一般的世界運動”。這樣一來, 中國就應該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但是當 ПУЛ 寫他的文章《爲什麼不容易做一個語言學理論家》的時候(這是一九二七年的事), 漢族已經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 一九一九年進行爭取自由解放的革命鬥爭, 反對國內的反動派, 反對國外的西歐和美國帝國主義者。這個鬥爭的規模和意義, 早在一九二五年 Δ世Y《カ》已經斷定說: “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這種力量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它在將來還會顯現出來的。”^① 正如咱們親眼看見的, 這些話完全得到了證實: 中國的革命

① 《Δ世Y《カ》全集》, 卷七, 293 頁。《在聯共(々)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1925 年 12 月。

勝利了，這一勝利使中國人民加入全世界先進民族的前列。

當然，ПЯЛ 無疑地知道 $\Delta\tau\Upsilon\alpha\lambda\iota$ 對中國革命力量的評價，他懂得漢族不但一般地參加而且也最積極地參加了“全世界的運動”。ПЯЛ 所以會把漢語列入原始時期的系統中，是因為他受了自己所造的理論支配，根據他的理論，一度由一般的世界運動脫離出來的民族，可以再加入這個運動，但是這民族的語言彷彿是凝固在它脫離時的狀態中。

因此，他就得出結論說，彷彿在咱們這個時代，漢族無論如何加入“一般的世界運動”，漢語無論如何接近“地中海的語言發生的中心”（ПЯЛ 認為這個中心彷彿是一切語言向前發展的泉源），也不能有什麼變化：漢語是已經註定要停留在它脫離全部語言系統的一般發展那個時候的狀態中。

試想想 ПЯЛ 這些假說並且從中求出自然的結論吧。

設想有某個民族的語言在咱們這個時代仍舊停留在化石的狀態，就是說，仍舊像它發生的時候一樣。ПЯЛ 認為這點並不妨礙這個民族走上“它的高度文化發展的新歷史道路”。^①這等於說，甚至這種原始狀態的化石的語言還能充分適合於滿足社會生活和文化的一切新的和最複雜的需求。因此就應該說，語言的構造對於語言滿足文化的需要的適合不適合沒有什麼意義，甚至原始時期的結構的語言也能滿足最高度的文化對語言的一切需求。這是從 ПЯЛ 的假說必然得到的第一個結論。

但是 ПЯЛ 的四個時期的公式，無疑地是基於語言發展階段論的觀念的。在發展中，每一時期形成新的、比過去更高級的階段。ПЯЛ 把印歐語系即第四時期的語言系統的出現說成彷彿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

① 《ПЯЛ 選集》，卷二。135 頁。(俄文)

造成的社會制度的革命所引起的更複雜的語言的出現，所以有這種說法。因此 ПУЛ 強調說，如果社會發展到更高階段，語言也就發展到更高階段。語言的這種發展，表現在它過渡到新的語言系統裏去。這是從 ПУЛ 的一般假說必然得到的第二個結論。

但是任何系統的語言，甚至停留在原始時期的化石的語言，當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走上“它的高度文化發展的新歷史道路”時，可以替它的民族服務，那麼怎樣可以不跟下面的假說衝突呢：“新的生產方式造成的社會制度的革命”，即是進到新的、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會引起語言向新的更高的階段的發展。矛盾是很顯然的。

在我們看來，矛盾的原因是語言發展階段論的偏見和事實的觀察間的衝突。ПУЛ 一方面一定要看見語言在一般的語言發生過程中經過不同的階段，由較低級的階段進入到較高級的階段，而這種過渡跟“新的生產方式造成的社會制度的革命”相適應，另一方面，他却不能不看到，停留在他認為低級階段的化石的語言，竟也能卓越地為它的民族服務，建立起擁有（在 ПУЛ 看來）較高級語言的民族一樣的文化。這一事實對於 ПУЛ 本人是很明顯的，似乎應該動搖他對於由低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的假說的信心了；但是結果並沒有。這一事實對於正確地對待某個民族的語言結構在創造其民族文化的作用也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拿漢語來說，這個矛盾特別顯著。ПУЛ 把漢語列入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裏。他當然需要用些什麼來支持這個分類法。這種論據就是把漢語看做是單音節的、一字多義的、沒有形態的語言。換句話說，他假設漢語的詞都是單音節的，每個詞（因此也等於每個字）本身就有一大批意義，這些詞在語法上是沒有任何形態的。

這些沒有形態的、合成的語言（膠着型語言也一樣）在 ПУЛ 看來

“是語言種類發生的各個時期的遺跡，是殘存的種類。”^①可是，ПУЛ 認爲是最原始的語言，以及他認爲其次的膠着型語言，却能很好地滿足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需要，這種民族的文化也像屈折型語言的民族的文化一樣高。歷史的事實證實了這一點。ПУЛ 也承認這一點。

但是，他承認這一點，却沒有注意到這些事實和承認這些事實的本身跟“殘存的語言種類”的假說互相矛盾。^②這兩個假說是不能相容的：如果語言是原始的，它就不能滿足具有高度發展的文化民族的需要；如果語言能夠滿足這種需要，不論它本身的結構如何，它就不能是原始的。^③因此，如果漢語過去實際上曾經作爲一種優良工具爲漢人服務過，現在仍舊服務於高度的文化，那麼自然很明顯，它決不會是原始的。

漢語的歷史事實和它的現狀不但明顯地揭露了 ПУЛ 的這種假說的根本矛盾，同時也推翻了他所臆想出來的公式和全部基本原理。

① 《ПУЛ 選集》，卷一，89—90 頁（俄文）。

(2) ПУЛ 的假說的錯誤

讓我們首先談談這個問題——說漢語由一般的世界語言發生過程中脫離出來，是它仍舊屬於原始時期語言系統的基本原因。按照 ПУЛ，這點應該跟漢族脫離“一般的世界運動”有關係。

可是歷史證明，事實並不是這樣。從有可靠的歷史記載的周朝開始，漢人的生活就不斷和周圍的遊牧部落接觸，這些部落的範圍不斷地擴大。根據現代的人種學知識，咱們知道這些部落屬於 ㄊXLㄎXL、蒙古、突厥、西藏等系統，也有些當時居住在中印半島的部落。這意味着，漢語是在滿洲 ㄊXLㄎXL、蒙古、突厥、西藏等語族的圍繞中發展起來的。

漢語也沒有跟印度的諸語言隔離開來。公元一世紀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進一步把梵語的知識帶過來。公元五世紀初，佛教經典大部份譯成漢文。漢族的和尚也懂得活着的印度語言：漢族的取經者到過印度，印度的佛教徒也到過中國。因此，咱們不能說漢語脫離了其他語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西藏語和中印半島（越南、暹羅、緬甸）的語言是沒有形態的合成的語言，滿洲 ㄊXLㄎXL 語和突厥語是膠着型語言，而梵語是屈折型語言，那麼漢語就不但接觸過前者，而且也接觸過後面兩種。因此，認為漢語脫離了一般的語言歷史是毫無根據的。這是第一個具體的歷史證據，證明 ПУЛ 關於語言脫離發展運動的假說毫無根據。

在 ПУЛ 的理論中，我們也不能得到解釋：為什麼滿洲 ㄊXLㄎXL、蒙古和突厥等部落還在遊牧或狩獵時代，他們的語言就已經發展到第二時期的語言系統，而同時漢族已經有了好幾個世紀的安定生活，有了高度發達的文化和國家。如果不是生活、不是社會發展、不是文化推動語言的發展，那麼是什麼呢？（ПУЛ 也這樣想過。）ПУЛ 又怎

樣可以得出結論說，蒙古語族、 $\text{X}L\langle\text{X}\rangle$ 語族和突厥語族屬於第二時期的語言系統（據他的解釋是比漢語更發達的）呢？ПУЛ 的階段論公式一旦跟人民的和語言的具體歷史接觸，就顯出它的毫無根據。

最後，咱們知道的漢語的歷史已經有三千年以上。有年代可考的記載開始於公元前七世紀。這些記載是多樣化的；它們反映漢族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中有偉大的哲學論文，極明白清楚地表達了理論思想的氣魄和力量。如果咱們更加通曉它們，就會知道古代和中古的中國的理論思想的發展，怎樣也不比古代希臘、中古歐洲和中世紀回教世界差勁。在咱們這個時代，社會科學部門的理論思想在中國的孫中山和毛澤東的著作中有了新的、高度的表現。咱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的著作在內容上是咱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思想最先進的表現之一。

這一切都證明漢語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複雜思想的有價值的表達工具，現在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用漢語已經翻譯出 $\text{X}\text{Y}\text{I}\text{L}$ 和 $\text{L}\text{X}\text{Y}\text{I}\text{L}$ 的著作，沒有碰到什麼困難，像用德文或法文翻譯一樣。任何著作，例如原子核物理學的著作，可以像用世界上任何文化很高的其他語文一樣用漢文寫出來。這一點是另一個證據，證明依語言發生時期而造的分類公式是毫無根據的。

(3) 漢民族的形成

漢語是什麼？首先我們要加上“現代”一詞，以後我們只談現代漢語。

但是在咱們的時代只談“現代漢語”仍舊不夠。ΔαΥα15 關於語言學的理論要求咱們有精確性。這個精確性在這裏包含一個定義：咱們所要談的現代漢語是什麼——是部落的、部族的還是民族的語言？我們要立刻回答：是漢民族語，是指這個概念的精確的歷史的意義。

應該說，漢民族語的問題不是那樣明顯和簡單。按照 ПУЛ5Δ 主義的語言學裏民族語的定義，在咱們這個時代，咱們是不是可以一般地說“漢族的民族語”，還是可以懷疑的。民族語是屬於民族的。漢族可以說是“民族”嗎？民族是歷史的範疇，形成於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當時是封建國家的中國，變成了西歐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這就阻礙了封建主義的瓦解，拖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相當地把它的发展方向轉向買辦的道路上，即是對於自己的國家最橫暴的道路上。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多麼不充分，可以從這裏看出：在一九一九年廣泛展開的民族解放運動提出口號不但要打倒外國帝國主義，還要打倒國內的封建主義。這自然阻礙了漢民族的發展，同時阻礙了漢語取得民族語的地位。在這裏，問題不在於很多方言繼續存在；當民族語已經充分形成，甚至存在了很久的時候，方言在某種程度還是可以存在的。問題也不在於舊的文言繼續存在；在東方各國，不但新的文學語言（即民族語的文學規範）充分形成之後，就是在它佔了優勢之後，這種舊文學語言有時仍舊能夠站得住。主要的問題彷彿是在於民族發展的基本條件不存在。作為一定的歷史範疇的民族，它的確立和成長是跟國內資本主義的成長分不開的。

無論如何，事實是這樣：咱們這個時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情況證明，

漢語作為民族語而發展着。問題在什麼地方？答案可能是這樣。

無論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分成長得怎樣慢，但它總是在發展中，況且時間已經很久了。在唐代（7—10世紀）已經有手工業者和商人階級的興起。在元代（13—14世紀）手工業和商業獲得尤其廣泛的發展。此後，這個階級慢慢地不斷地成長。在清代（17—19世紀），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上已經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朝於一九一一年被推翻。這次革命是覺醒中的亞洲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影響下的表現之一。皇帝的推翻和民國的建立是全中國人民的事業，但是同時也證實了資產階級的力量的增長。這個資產階級在當年趕快用他們所需要的思想武器武裝自己，以便和代表清代封建主義的官方思想的儒教作鬥爭。毛澤東在他的一篇著作裏指出，什麼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以嚴復輸入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亞丹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穆勒的形式邏輯與法國啓蒙學者孟德斯鳩輩的社會論為代表，加上那時的自然科學，是‘五四’以前所謂新學的統治思想。”^①毛澤東又說，當時中國基本上仍舊停留在封建制度上，這種啓蒙，這些思想在當時是有革命意義的。因此，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這種資產階級不是以前在封建主義統治下和封建主義共處的資產階級，而是企圖奪取政權、用資產階級的全民族反封建鬥爭的思想武器武裝自己的新的資產階級。

情況雖然如此，但仍不能說一九一一年革命後，中國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到來了。這個大國的農業繼續停留在封建階段；廣泛發展的、具有封建組織形式的手工業生產仍舊相當落後。資本主義的工業只在若干大城市中發展，而且不是完全落在外國人手裏，就是或多或少

^① 《新民主主義論》。（此處本文作者根據舊版本，未曾修正。）

地依賴於外國資本。這個大國受着雙重壓迫：本國的反動封建主義和外國的帝國主義。這個資產階級有受過教育的自己的知識分子幹部，其中相當大部份曾經是自己階級的先進思想的代表者和傳播者，但是總的說來，這個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在政治鬥爭上沒有足夠的經驗，也不傾向於決定性的發動。

歷史證明，千百萬農民被迫在悠久的封建壓迫的條件下生活和勞動，全國人民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深深感覺到帝國主義的壓迫，這兩重壓迫使得全中國人民羣衆起來反抗祖國的兩個敵人。這種反抗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如毛澤東所說，它是反帝國主義的同時又是反封建主義的，但是它的歷史意義是：“澈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澈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①

可是，有一種特別的歷史情況，對這個運動的發生本身，對它的規模，對它的如此尖銳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方針有決定性的影響。即在一年多以前，在俄國發生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人民看見了這個，在俄國革命之後，又看見了其他國家也爆發了革命運動。這一些對於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毛澤東關於這個這樣寫道：

“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②

此後中國發生了什麼，咱們都親眼看見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這個廣泛展開的中國人民革命鬥爭進行了三十年。它經過了它發展的若干階段，終於完全粉碎了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國內反動派，同時也粉

^①、^②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1頁。

碎了竭力支持反動派政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說到這個鬥爭的結局時寫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①

可是一九一九年以後革命運動的高漲和它的這種結局只有在另外的力量成爲鬥爭的領導力量時才能獲得，這種領導力量決不是資產階級；它是另外一種思想所鼓舞的，決不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毛澤東寫道：“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②工人階級和它的共產黨站在解放鬥爭的前頭。因此毛澤東寫道：“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在‘五四’以後……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③整個來說，鬥爭勝利的結局意味着在中國“……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④

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完全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而獨立，使中國人民成爲自己的土地的真正的統治者和主人；它清算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把土地和自由交還給國內人數最多的農民階級；它粉碎了大的買辦資本

-
-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6頁。
 - ②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63頁。
 - ③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69—670頁。
 - ④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6頁。